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為了紀念創刊十五周年，本期擴充十六頁版面，也使這個小小的欄目增添了一頁，容納更多讀者的意見。令編者欣慰的是，讀者在閱讀本刊文章時，都能提出不同意見或進一步的思考；尤令編者吃驚的是，一位居鄉間的離休老幹部竟然能夠讀到本刊2月號有關重評陳獨秀的一組文章，並發表見解。

從來，讀者的意見，不僅對作者有啟發，更是對編者的激勵。本欄雖小，但作用不可謂不重要，希望繼續得到讀者支持。

——編者

宋以後中國就形成了民族國家嗎？

葛兆光〈重建「中國」的歷史論述〉（《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一文，對於重新認識與研究中國歷史很有啟發性，尤其是其關於與歐美相比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獨特性的論述。不過，對於其認為傳統中國在宋以後就已經漸漸形成了民族國家的論述，筆者認為還有商榷的餘地。

在葛文中，他認為由於歷史上「政治王朝」「始終有一個清晰延續的脈絡」，以及始終

存在「一個相當穩定，不斷積累」的文化傳統，並認為宋之後中國開始慢慢形成了民族國家。在這裏，葛先生實際上忽視了民族國家中一個最為核心的認同，即政治認同。政治認同最為核心的要素，又是對「國家是誰的國家」這一問題的反思與回答。可以說，沒有政治認同就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政治認同恰恰是傳統中國最為缺乏的。因此，僅僅從葛先生所指的意義上稱傳統中國從宋開始就慢慢形成民族國家是不恰當的。

我認為政治認同主要是在以下兩個層面上使用：

一個是國民對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超越了對其他亞政治文化與區域的認同。比如對種族、宗族以及地方政治單位。在這一方面，傳統中國是極端缺乏的。近代中國有兩點最經常被提到，一個是群體意識與合作意識的淡薄，一個就是沒有國家觀念，「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

另一個是在國家權力配置過程中，國民某種形式的參與。正是由於國民參與了「國家權力配置」過程，所以國民才認同國家。從這一點看，傳統中國也不具備。國民很少或

者根本就沒有參與國家權力的配置，因此大多數國民認為國家是皇帝的「私產」。

實際上，這種現代政治認同本身是需要一系列條件的，尤其是交通與傳媒，從這方面講，民族國家實際上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物。

在傳統中國，人們最為根本的認同不是政治認同，而是文化認同，也即葛先生所說的人們認同的是「炎黃子孫」。這種文化認同對共同體的維持的力量遠遠大於由政治認同而帶來的向心力。但是近代中國很多知識份子為了重構人們的政治認同而對傳統文化的認同進行了顛覆，實際也消解了人們的文化認同，這一點也需要今天的人們加以反思。

余艷紅 北京

2005.9.8

東亞史觀的建立需從長計議

誠如白永瑞在〈東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一文（《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所言，「歷史戰爭」構成當今東亞的特殊景象，在2005年這個年份彌顯刺眼。其一，部分日本人否認侵略史實，甚至美化其殘忍行徑，宣稱要擺脫他國強加的「自虐史觀」，恢復其歷史本原；其二，中韓朝回顧過往屈辱時，難以割捨強化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傳播的大好契機。此外，在推行一致對日的「歷史戰爭」的同時，中韓朝之間的局部「歷史戰爭」也蠢蠢欲動。

因此，特別是針對日本的不負責歷史態度，中日韓三國民間學者為闡述三國歷史共識而編撰共同歷史教科書。

我們應該以最大善意來解讀這一探索，但我們更應該以冷靜態度來分析未來事態。

首先，東亞史觀是甚麼？是不是東亞歷史的機械相加？各國興衰都應是東亞整體史觀的重要環節，而不能流連於國家沉浮的情緒。日本的過激民族本位和抗拒反省的心態，是其最大絆腳石；但一致對日，也不能構成東亞史觀。儘管教科書以平行編年來演進，但其割裂痕迹依舊明顯；各國都希望東亞史觀偏向於本國立場。儘管編纂時的頗多爭論限於學術範疇，但其蘊涵的民族主義仍顯露無遺。

另外，樹立東亞史觀固然重要，但民族國家依舊存在，倘若國族史還處於孱弱地位，那麼倉促建立超越民族國家的史觀，就有好高騖遠之嫌。歷史問題並不能都歸咎於日本。就中國而言，海峽兩岸的不同版本歷史敘述和韓朝對峙只會兩敗俱傷。各國都背負着過重的歷史累贅，眾多未決的歷史糾葛使東亞史觀步履艱難。

所以，東亞史觀仍需從長計議。但不論結果如何，共同歷史教科書是個不錯的開端。對學者而言，應該繼續以「理念人」的姿態追求還真相於東亞民眾；對國家而言，面對尊崇強者的日本，也許實力在這個冷戰痕迹明顯的地區更為重要。

毛維准 天津
2005.9.7

以文化的名義

如同海德格爾借荷爾德林的詩歌闡發人類本真的「存在」，日本的文學批評家江藤淳從川路柳虹的《魂兮歸來》一詩中發現了日本文化中「獨特」的風景——「與死者的共生感」，如此富有詩意的演繹充滿詭秘與玄妙。其實邏輯很簡單：既然日本文化中有「與死者共生」的獨特傳統，那麼祭拜靖國神社就屬應有之義，外人就不得說三道四，從而達到「從日本文化本原出發，來論證首相、天皇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合理性的目的。然而，靖國並非日本的文化傳統，高橋哲哉的文章〈靖國是日本的文化嗎？〉（《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以大量事實輕易戳穿了這個荒謬的邏輯前提。

以文化的名義尋求「靖國」的合法性，來掩飾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喧囂，這是文化論者的潛在意圖。「是」抑或「不是」，高橋教授只是關注內容層面的問題，在這裏我想就「以文化的名義」這種表述方式接着說幾句。

名不正，則言不順。大凡一種社會行為，須得有個依據，而「古已有之」是最方便的遁詞。與傳統對接，或乾脆抽象出一種文化模式，塗飾上卡里瑪斯的神聖色彩，為自己的行為張目，這並不是甚麼新招。「文化」這個東西太駁雜，內涵太豐富，誰都可以在其中「取一瓢飲」，江藤不就是很方便地在日本文化中發現了「與死者共生」的傳統嗎？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作為，在國際上塑造出強悍的形象，引人注目。於是，人們抑

制不住從文化中探究深層原因的衝動，文化論甚囂塵上，批評家從詩歌裏發現傳統，政治家從歷史中發現傳統，人類學家則從日常行為中去尋求傳統。江藤並非文化論者第一人，真正的濫觴者是美國的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她坦言自己未在日本待過一天，卻在《菊與刀》中簡便地概括出日本不同於西方「罪感文化」的「恥辱感文化」傳統。更讓人困惑的是，這份報告成為美國戰後在日本制定政策的依據，促成保留天皇制度的依據，美國人以文化的名義為軍國主義的復活預留了地盤。

用文化塑造出來的日本形象，在菊花與刀的幻影中透露出幾分威嚴，讓他人敬畏，反過來又促成一種自戀，這種自戀正是滋生軍國主義的溫牀。「魂歸何處，何罪之有？」川路柳虹的詩句正是文化論者不經意的流露。

易前良 南京
2005.9.4

改革與繼承二者不可偏廢

羅志田在〈數千年中大舉動——科舉制的廢除及其部分社會後果〉一文（《二十一世紀》2005年6月號）分析了清末廢科舉的前因後果。作者認為，廢除科舉對中國造成了兩個影響深遠的社會後果，即城鄉逐漸分離；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作者觀點極富洞察力，也具有現實借鑑意義。

文章指出，中國傳統士人的耕讀生活模式，多數人是在鄉間讀書，繼而到城市為官，但候缺、丁憂、告老時，讀書

人多半要還鄉。這就意味着人員、信息、資金等多渠道的流通，從而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流動之中。而廢科舉後城鄉差距日益加大，成為中國社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作者認為，傳統中國基層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實行以鄉紳為核心的自治。但隨着科舉制廢除，「鄉紳」與「知識」的疏遠可能意味着相應的道義約束日減，容易出現所謂「土豪劣紳」。傳統的士人主要以道德說教，自身的模範去調適、化解地方矛盾，但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關係的複雜化，就應更多地以法律手段去解決，這又是傳統士人所忌諱的。所以科舉制的改革又是必要的。

但問題在於廢科舉後中國既沒能實行選舉制，又沒實行文官制，而是以任命制代替科舉制，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倒退。好的東西沒有通過改革引進來，卻將具有公開、公正性的考試取士制丟掉了，難怪作者認為廢科舉是中國二十世紀一系列斯文掃地活動的開端！

儲昭根 南京
2005.7.1

利益鏈和利益鏈之外

城市外來人口現象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縮影，它所展現的各種主體利益的博弈，不但深刻地影響着我們的社會和生活，而且是中國進步的一個尺度。在陳映芳〈「利益鏈」如何形成〉(2005年8月號)一文中，政府、企業、老市民、外來人口，這四個涉及外來人口問題的主體，都表現了複雜的態度和行為。政府的角色尷

尬是最明顯的：一方面它不能拒絕外來人口對本地經濟的貢獻，另一方面又不願支付外來人口的市民權；它既要對外來人口採取就業的身份歧視，卻不能貫徹它的意圖，甚至城市基層政權與外來人口混為一體；一方面它不斷削減對外來人口的限制，另一方面又發現完全取消限制會帶來巨大的城市危機。關於後一點，北京最近頻頻拉響了控制人口的警報，政府的擔憂與市民的支持在這一點上表現出空前的一致。

城市化雖然是現代化的普遍規律，但是，一個有十三億人口國家的城市化，世界還未有先例。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基數如此龐大、資源又相對短缺，世界市場容量的限制，以及城市本身的發展規律，中國的城市化還面臨着諸多考驗。就算中國城市化的指標是70-80%吧，也就是說會有十億左右的城市人口，這麼大量的人口如何在城市生活？又有哪種形態的城市規模和類型，才能適應這種城市人口？

——不過，這是另一個問題了。但我以為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希望能看到城市研究學者的回答。

王霄 北京
2005.9.3

對重新評價陳獨秀的感受

在中國當代變革史上由於受極左文化的干擾，在表述歷史事件和人物之時，存在着太多的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困惑，其中對陳獨秀的評價極為典型。這一兩年來，從大陸出版的《炎黃春秋》、《同舟共進》

這些刊物上，已經出現了重新評價陳獨秀的文章，為這一歷史文化課題開闢了新天地。但由於受當今主流文化的制約，對陳獨秀的評價還沒到位，就像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尚未到位一樣，至少比《二十一世紀》2005年2月號刊登的郭德宏、唐寶林和王福湘文章所表達的觀點相差很遠。

其實依我愚見，科學和公正地評價陳獨秀和毛澤東，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對陳獨秀和毛澤東的評價是當代中國歷史文化的焦點和核心。因為毛、陳思想差異之爭涉及到中國社會變革的根本問題，是項重大的歷史文化工程，應該很好地完成。也就是說，只有正確評價歷史人物，才能使愚昧專制的文化失敗，才有科學民主思想的勝利；中國才有光明的前途，並有利於整個世界人類文明的事業。這就是本人閱讀三篇評價陳獨秀文章的感受。

中共黨員離休幹部 楊楓 萊州
2005.5.19

更正與致歉

在8月號薩勒〈日本的政治、回憶和歷史意識〉一文「當路易十四於1789年7月14日在他的日記中寫下……」一句中(頁32)，「路易十四」應為「路易十六」。由於我們編輯工作疏忽，未能改正譯文中的錯誤，特此說明並向讀者致歉。

編輯室
2005.9